

前 言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这场斗争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孔老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他所创立的儒家学派，厚古薄今，主张开历史的倒车。孔孟之道，是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批判孔孟之道是一个需要反复进行的艰巨的斗争任务。反孔与尊孔的斗争，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阶级内容和政治内容，但都是当时阶级斗争、党派斗争的一种形式，是政治思想领域两条路线的斗争。当前我们批判孔孟之道，正是为了深入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就要同孔孟之道作坚决的斗争。不批孔，批林就不能彻底，反修就不能彻底，防修就没有保证。为此，我们编写了《开历史倒车的儒家学派》这本小册子，供广大工农兵群众批林批孔时作参考。

儒家的代表人物，除春秋战国时期的孔丘、孟轲外，还有汉代的董仲舒、唐代的韩愈、宋代的程颢、程颐 and 朱熹、陆九渊、明代的王守仁以及近代的曾国藩等。这里我们简要

地批判介绍儒家的主要代表孔丘、孟轲、董仲舒、朱熹的反动思想。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难免有缺点和错误，欢迎读者给以帮助和指正。

一、孔丘——反革命复辟的祖师爷

孔丘，字仲尼，排行老二，人们叫他孔老二。鲁国（在今山东）人，生于公元前五五一年，死于公元前四七九年，出身于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家庭。

孔丘生活在春秋末期。这是我国历史上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社会大变革时代。当时，天下大乱，奴隶们纷纷起来造反，从孔老二生下来到他死前的七十多年，在陈国、郑国、周王室、晋国、卫国等，先后多次爆发了奴隶的反抗和起义。特别是奴隶起义的杰出领袖柳下跖领导的奴隶起义队伍，人数多至九千余人，纵横天下，叱咤风云，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腐朽的统治。

这时在生产上，随着铁器和耕牛的广泛使用，生产力不断发展，使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个体生产成为可能。新的封建生产关系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新兴地主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在奴隶起义的推动下，新兴地主阶级向奴隶主贵族展开了夺权的激烈斗争。

奴隶起义、平民暴动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汇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洪流，有力地冲击着反动腐朽的奴隶制度，整个奴隶主贵族的统治陷于风雨飘摇之中。但是，奴隶主阶级决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必然地要做垂死的挣

扎。因此，变革与反变革、夺权与反夺权、反复辟与复辟的斗争，就成为当时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表现。

孔老二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他从小接受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教育，年轻时当过管粮草和牛羊的小官，给奴隶主贵族们办理过婚丧之事，当吹鼓手，这种职业那时叫做“儒”；后来因他当官又讲学，站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立场上，培养了一批复辟奴隶制的知识分子，逐渐形成了一个学派，后人就把这个学派叫“儒家”。孔老二曾一度爬上鲁国警察总监和代理宰相的要职，仅仅三个月就被赶下了台。下台后，他带着学生东奔西窜，各处游说，推销“克己复礼”的反动主张，结果到处碰壁，只好回到鲁国继续讲学，为复辟奴隶制制造反革命舆论。

孔老二是个不学无术的家伙。《论语》这部儒家的经典也不是他亲笔所作，是他的徒子徒孙根据孔老二的言行东拼西凑搞成的。

在当时社会的大变革中，孔老二顽固地站在奴隶主阶级的反动立场上，极力反对当时的社会变革，妄想维护和复辟西周的奴隶制度。但是，历史的巨轮，粉碎了孔老二复辟的迷梦，他最后只好哀叫着“吾道穷矣！”去见了周公。

（一）“克己复礼”——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政治纲领

“克己复礼”，这是孔老二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的政治纲领。有一次，孔老二的学生颜渊问什么是“仁”？孔老二回答

说：“克己复礼就是仁”。这里，克己，意思是克制、约束自己的言行、思想；复礼，是恢复西周时期建立在奴隶制井田制基础上的宗法等级、分封、世袭等一整套奴隶制上层建筑。“克己复礼”是说，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于周礼，使一天天崩毁的西周奴隶制度得到巩固和恢复起来。颜渊又继续问孔老二：做到“克己复礼”的具体方法是什么？孔丘说：“不符合周礼的东西不看，不符合周礼的声音不听，不符合周礼的话不说，不符合周礼的事情不做。”又说：“一旦能够做到‘克己复礼，天下的人就会归顺你的统治了。”

在当时社会大变动的时代，奴隶制没落，封建制兴起，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顽固地站在没落奴隶主贵族立场上的孔丘，声嘶力竭地叫嚷所谓“克己”，就是要奴隶主贵族内部加强勾结，防止互相倾轧，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奴隶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对奴隶主贵族以外的革命阶级来说，就是要束缚他们的思想，控制他们的行动，防止他们起来“犯上作乱”，不准他们造反，以维护摇摇欲坠的奴隶主阶级的专政。

孔丘鼓吹“克己”的目的是为了“复礼”。这个“礼”是奴隶主贵族享有的特权，是他们的财产、权力、名分等级的标志。礼是奴隶主贵族的命根子。没有礼，就不能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就不能限制和压制新兴地主阶级。在孔老二看来，如果丧失了礼，那么，道德仁义等就都要破产了，对人民无法控制，名分等级制度无法维持，奴隶主贵族内部无法团结；就要弄得奴隶主贵族威风扫地，管理不了军队，执行不了刑罚 就连祭祀鬼神也搞不下去了。总之，“有礼则安 无礼则危”（《礼记·曲礼上》）。孔老二认为 这个礼 也就是西周的奴

隶制的社会制度 是最美好的 千万破坏不得。他说：“周代的制度多么昌盛 多么丰富多采呀 我崇拜它！”（《论语·八佾》）又说：“假如有人用我，我要使周代的制度在东方复兴起来！”

孔老二连做梦也想要恢复的西周奴隶制，是极其反动黑暗腐朽的社会制度。它的‘昌盛’和‘多采’正是奴隶的鲜血凝成的。在这种制度下，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奴隶主根本不把奴隶当人看待。一匹马一束丝就能换五个奴隶。奴隶没有任何人身自由，被迫从事极繁重的劳动，受到残暴的压榨。稍有反抗，轻则鞭打，重则割鼻、挖眼、断手砍脚，甚至被杀死。而奴隶主却靠着榨取奴隶的血汗，过着极其奢侈腐化的生活。甚至在他们死后，还要杀死或活埋大批的奴隶作为殉葬品，有时一次杀殉达几百人之多。这就是孔老二要复的“礼”，它是奴隶主的天堂，奴隶的地狱！

可是，到了春秋晚期，由于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的不断斗争，奴隶制度迅速地解体和崩毁。据记载，这个时期先后有五十二个奴隶制诸侯国家灭亡，三十六个奴隶主国君被干掉了。社会在变革，时代在前进！奴隶们在斗争中争取解放，新兴地主阶级在夺权中不断取得胜利。而有的奴隶主贵族没落下来，沦为奴隶。旧的奴隶制的井田制和宗法等级、分封、世袭等制度，逐渐被打破了，与等级制相适应的礼节仪式也搞乱了，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局面。

对于这个天下大乱的革命形势，孔老二既痛心，又仇恨。他一边大骂“天下无道”，一边祭起“克己复礼”的破旗。孔丘把“礼”比作堤防 妄想用‘礼’来防止奴隶的反抗和新兴

地主阶级的崛起。他知道一旦堤防决了，旧礼失去作用，就会给奴隶主贵族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所以他说：“凡是坏国、丧家、亡人，必然是先失去了礼。”（《礼记·礼运》）在孔丘看来只要“复”了“礼”那套为奴隶主贵族统治服务的旧制度就可以维护和巩固，他们的特权、财产、地位就有了保障。总之，实现了“复礼”，不仅可以使奴隶主贵族避免“坏国、丧家、亡人”的莫大灾难，而且可以达到“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目的，即恢复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接续断绝了世袭地位的贵族世家，让被打倒的旧贵族重新上台。这就是孔丘的一条反革命的政治路线。

为了实现“克己复礼”孔老二还提出了“正名”的反动政治主张。所谓“正名”，就是用西周奴隶制的等级名分去纠正已经变化发展的社会现实，以维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个奴隶制的旧秩序。“正名”的实际内容，正如孔丘自己讲的，就是“君主要象个君主，臣子要象个臣子，父亲要象个父亲，儿子要象个儿子”，各守本分。在孔丘看来，贵贱有别，这是常理，奴隶主永远是统治阶级，奴隶则永远是被奴役的对象，这种等级名分是不能改变的。

但在春秋时期，奴隶的起义，新兴地主阶级向奴隶主贵族的夺权斗争象“子杀父”、“臣杀君”的事越来越多，严重地破坏了奴隶制的旧秩序，出现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变乱局面。如何改变这种局面呢？孔老二认为，“正名”最为紧要。他说：如果名不正，权力就不在手，奴隶主发了号令也没人听，奴隶们就会起来造反，奴隶主的事情就不好办。只有通过“正名”，君使用了君的权力，臣尽

到巨的本分，象周初那样，制定典章制度和出兵征伐等国家大事都由周天子下令，而做臣的就要忠于君主，不得犯上作乱，不得杀君杀父，不得僭越职权，如有违反，臣不象臣，天子就用手中的权力加以制裁；而那些被推翻的君主和丧失了世袭特权的奴隶主贵族，通过“正名”，就应恢复其原有的地位和身分，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至于奴隶造反、新兴地主阶级夺权完全是“名不正，言不顺”应该通过“正名”，受到制裁或镇压。可见，孔老二的“正名”，在政治上是极端反动的，是为维护和复辟奴隶制、镇压革命势力服务的，是一种主张复旧，反对革新的反动政治说教，也是“克己复礼”这个反动纲领的组成部分；在认识论上则是唯心主义的，它妄图用主观设置的“名”去改变已经发展的客观现实，因而只能遭到彻底破产。

孔老二不仅有一个“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和一整套复辟奴隶制的反动主张，而且有复辟奴隶制的反革命行动。他极端仇视奴隶起义，仇视当时社会大变动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变革行动。

公元前五二二年，郑国奴隶主在一次镇压奴隶起义时，残酷地杀了全部起义的奴隶。对于这件事，孔老二狂叫：“杀得好！对奴隶太宽了，他们就要造反，必须严厉镇压才行。”（《左传·昭公二十年》）孔老二在鲁国代行宰相职务仅三个月，就把革新派人士少正卯杀害了，还将尸体示众三天，完全是法西斯行径。当孔老二七十一岁、重病在床的时候，听到齐国新兴地主阶级杀了奴隶主头子齐简公，并夺取了政权，他还拚老命挣扎着爬起来去见鲁君，请求出兵征讨，充

分表现出了他反对革命的顽固性。

对于新兴地主阶级的种种改革措施，孔老二都极力加以反对。鲁国新兴势力的代表季孙氏，实行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田赋改革，孔老二就搬出“周公之典”大肆攻击。晋国铸了刑鼎，把法律条文公布出来，限制了奴隶主贵族为所欲为的权力。他知道之后，气得发抖，大骂晋国背弃了祖宗之法，诅咒他们“贵贱无序”，快要亡国了。季孙氏等三家不顾奴隶制的等级限制，在自己管辖的区域内建立起都城，并且拥有军士武装，孔老二也感到这是对奴隶主贵族统治的重大威胁，便大骂他们不安本分，并策划和煽动了一些人去拆毁他们的都城。这一桩桩违反“周礼”的事实，孔老二都认为是大逆不道，今不如昔，“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克己复礼”，就是倒退复辟。孔丘这条反革命的政治路线，集中地体现了没落腐朽的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反映了他们不甘心失败，要与进步革命势力拚死斗争、顽固开历史倒车的反动阶级的阶级本性。

历代反动统治阶级都把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作为他们顽固守旧、反对变革、镇压人民的思想武器。宋代儒家的代表人物朱熹说孔丘的“克己复礼”是千百个“圣人”代代相传下来的最关紧要的精神法宝，建议皇帝以此作为维护其统治的武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曾国藩，把“克己复礼”当成支配万事万物的根本信条，鼓动他的喽啰们为此而卖命。独夫民贼蒋介石也把“克己复礼”写在国民党《党政工作人员须知》的手册中，作为训练法西斯党徒的一个重要准则。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

也紧紧抓住孔老二的“克己复礼”不放，认为“唯此为大”。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到一九七〇年一月，在不到三个月内，就多次书写了“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条幅，充分暴露了林彪迫不及待地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他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疯狂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极力污蔑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事物和大好形势，叫嚷要对被打倒的阶级敌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使他们重新上台，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

林彪和孔老二虽然相隔了两千多年，所处时代不同，“克己复礼”的阶级内容也不一样，但他们的思想却是一脉相承的，搞的都是一条反对变革、反对新生事物、复辟倒退的反革命路线。他们都是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只不过一个是恢复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一个是复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一个是接续断绝了世袭地位的贵族世家，一个是恢复地主资产阶级失去的“天堂”；一个是把没落的旧贵族扶植起来，一个是为地富反坏右鸣冤叫屈，为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翻案，让那些牛鬼蛇神重新上台。

林彪还以孔老二的“正名”为根据，制订了反党的政治纲领：“狂叫‘开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由他“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

毛主席说：“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林彪就是这样的反动派。他拣起孔老二“克己复礼”的破旗再三挥舞，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不过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

（二 鼓吹“仁爱”、“忠恕”、“中庸”的 反动说教

孔老二为了推行“克己复礼”的反革命政治路线，还狂热地鼓吹“仁爱”、“忠恕”、“中庸”的反动说教。

仁，是孔老二整个反动政治伦理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目的是为了解决当时奴隶主阶级的内部矛盾，并企图用它腐蚀瓦解新兴地主阶级的斗争意志。以后，反动统治阶级进一步把它推广，用来毒害被统治者与被剥削者。

仁的根本是孝和悌（《论语·学而》）。所谓孝，就是对父母、对祖先要孝顺；所谓悌，就是做弟弟的要尊重哥哥。孔老二为什么把孝顺父母，尊重兄长作为“仁”的根本呢？我们知道：在我国古代奴隶制社会，许多奴隶主贵族都属于同一姓氏，有共同的祖先，家庭中实行父权家长制的统治，父权高于一切。这种特点与政治上的等级关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等级奴隶制。如果人人都能对祖先、对父母尽孝道，与平辈兄弟相亲相爱，就可以上下左右地把奴隶主勾结起来，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也就能够巩固了。

但是，到了春秋末期，这种宗法关系遭到了破坏，尤其是从奴隶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新兴地主阶级，打破了奴隶制宗法关系的束缚，儿子起来造老子的反，有的甚至用暴力赶走或杀死残暴的国君。孔老二认为这种“犯上作乱”的行为，是对祖宗的背叛，所以他大力提倡“孝悌”。他的学生有若

说：“如果做人都讲孝悌，那么，喜欢‘犯上’的也就少了，连‘犯上’的事都不干，起来‘作乱’的事就更不会发生了。”孔老二认为：要是奴隶主贵族们都能讲孝道，那末奴隶也就会用这种态度对待奴隶主。很清楚，孔老二强调“孝悌”是仁的根本，是把孝悌与解决上下、贵贱的矛盾联系在一起，妄图用家族道德观念，来维护奴隶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旧秩序，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犯上作乱”，反对奴隶起义，反对革命，实现“克己复礼”。

但是要能够维护所谓‘天下有道’的旧秩序，光有‘孝悌’还不够，孔老二认为，还要提倡和实行“忠恕”。

孔老二宣扬的‘忠’就是要使怀有异心的人们归顺过来，最根本的就是要奴隶们和新兴地主阶级服服帖帖地接受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统治。要奴隶们忠于奴隶主，奴隶主忠于诸侯，诸侯忠于周天子。显然，孔老二提倡的“忠”，目的就是巩固各级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统治，维护摇摇欲坠的奴隶制的等级制度。

孔老二鼓吹的“恕”，有两方面的含意：一方面，是要实现奴隶主阶级内部的反革命勾结，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就是自己所不愿意的，不要强加给别人，要求奴隶主阶级内部彼此不争，以和为贵；另一方面，是要奴隶们和新兴地主阶级不要跟奴隶主阶级进行斗争，应实行“犯而勿校”（《论语·泰伯》）和“不念旧恶”（《论语·公冶长》）的道德信条，诱使革命阶级不要“犯上作乱”，不要变革，不要推翻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统治。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犯而勿校”、“勿念旧恶”的格言，是卑怯的坏人所创造的，因为他貽

害于人而怕人来报复，便骗以宽恕的美名”。

由此可见，孔老二的“忠恕之道”，就是维护和恢复奴隶主贵族的统治，镇压奴隶反抗、反对新兴地主阶级变革的反革命之道，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思想武器。

但是，孔老二这个“滑得可观”的“巧伪人”却偏要掩盖其反动主张的阶级实质，竭力鼓吹超阶级的所谓“仁爱”、“忠恕”，说什么实现了“忠恕之道”，也就实现了对他人的“爱”。

孔老二难道真的爱一切人，对一切人都实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绝对不是。牠所说的“忠恕之道”是具有鲜明阶级性的，是在“礼”的范围内讲“忠恕”。离开了“礼”，既无所谓“忠”，也不存在“恕”。人们之间，只能按照“礼”的规定，根据各自的等级名分来互相“推己及人”。孔老二说：“如果不用礼来节制，调和是达不到目的的。”（《论语·学而》）。可见孔老二讲“忠恕”，就是妄图恢复被破坏了奴隶制的等级制，在维护西周奴隶制的条件下，号召奴隶主阶级内部实行“互相体谅”。对于奴隶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来说，则是“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孔老二不仅恶毒咒骂劳动人民是“不可与同群”的“鸟兽”（《论语·微子》），主张对起义的奴隶要斩光杀尽，而且对新兴地主阶级也切齿痛恨。可见孔老二所鼓吹的“仁”就是杀人、吃人；“忠恕之道”就是剥削、镇压之道。孔老二开口“仁爱”，闭口“忠恕”，伪装一副正人君子的面孔，而实际上是一个心狠手毒、阴险狡滑的反革命两面派。

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刻指出：“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

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在当时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孔老二决不会爱一切人，他自己也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卫灵公》）可见他是有所爱有所恨的。他喜欢的是所谓有仁德的人，即统治阶级中的搞复辟搞倒退的反动派——奴隶主贵族，所憎恨的是所谓“不仁”的“小人”，即广大的奴隶和坚持变革的新兴地主阶级。这就是“仁爱”的阶级实质。

对于孔老二的这一套孝、悌、忠、恕的仁爱说教，当时的广大奴隶是看得很清楚的。奴隶起义的领袖柳下跖就尖锐地指出：“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弃也。”他列举了大量事实，戳穿了孔老二这一套说教的虚伪性和反动性，并且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奴隶们自己的道德观。

孔老二为了实现“克己复礼”，在贩卖“仁爱”、“忠恕”这套黑货的同时，还提出了“中庸”之道。什么是中庸呢？所谓“中”就是不要达不到，也别过了头；“庸”就是指“常规”的意思。不要达不到、不过头也好，常规也好，都有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周礼”，要求一切都按西周奴隶制的老一套办事，不容许有一丝一毫的违背和偏离。

对于这种“中庸之道”，孔丘把它捧的非常高，他说“中庸”是一种最高的美德，可惜实行它的人早就没几个了，现在只有很少的“仁人”君子按中庸办事，而那些众多的小人是与“中庸”相反的。可见，“中庸”的提出是因为不“中庸”的存在，是由于奴隶们不断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的造反，打破了旧秩序和旧传统，动摇了整个奴隶制度。比如鲁国的季孙、孟孙、叔孙三家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他们的私田一天天增加，势

力一天天扩大，侵犯了鲁国奴隶主国君的利益，孔老二就认为太过分了，是“过其所爱”。当时郑国的许多奴隶，在奴隶主的残酷剥削压迫下，纷纷起来造反，破坏了奴隶主的统治秩序，威胁着奴隶主的反动统治。孔老二认为这是“小人反中庸”的突出表现。又如，当时晋国的范宣子制订法律，并且把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孔丘认为这样一来，就使得奴隶不尊重贵族，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就会完蛋，他叹气说：“晋大概快要亡了因为他们没有‘度’了。”（《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孔丘所说的“度”指的就是奴隶制度的规范——“礼”。没有“度”，就是破坏了中庸之道。

可见孔老二提倡的“中庸”是实现“克己复礼”的一种反动思想武器，用它来反对革命、反对斗争、反对破坏旧制度，妄图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

从哲学上说，“中庸之道”是把事物看成一成不变，要永远保持旧的矛盾统一体，否认有矛盾有斗争，否认矛盾的转化，否认质变和飞跃。这是彻头彻尾形而上学的观点。正如毛主席所指出：“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

在中国历史上，从孔丘开始，凡是反动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为了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维护旧制度、旧秩序，都鼓吹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性，宣扬“仁爱”、“忠恕”、“中庸”等谬论，提倡阶级调和，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反对变

革，反对革命，反对社会的前进运动。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也继承孔老二的衣钵，鼓吹“以仁爱之心待人之忠，以宽宥原谅之恕”，叫嚷“中庸之道……合理”，把它们作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重要思想武器。他恶毒攻击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绞肉机”攻击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全左”、“凭幻想胡来”；咒骂我们党对叛徒、卖国贼王明的斗争，以及反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是“斗绝了”、“做绝了”、“乱了套”把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说成是“过分”、“过极”；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他一面大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面在暗地里磨刀霍霍，炮制《“571”工程纪要》妄图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他的这种极其凶狠残暴的行径，戳穿了他兜售“仁爱之心”、“忠恕之道”、“中庸之道”的虚伪画皮，暴露了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妄图在我国实行封建法西斯血腥专政的罪恶野心。

（三）宣扬“生而知之”的天才论

孔老二为了复辟奴隶制，在哲学上又鼓吹了“富贵在天”的天命论和“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天才论，为“克己复礼”的政治路线制造理论根据。

在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转变的春秋末期，孔老二大讲“天命”他所说的“天命”就是指宇宙间的最高主宰——天老爷的意志，这完全是唯心主义的神学说教，其目的无非是论证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是天老爷安排的，奴隶主阶级专政是

神圣不可侵犯、不得改变的。有一次，孔老二和他的弟子游说列国，宣扬复辟奴隶制的政治主张，在回来的路上被匡人围住，他吓得不得了，后来侥幸地逃了出来，恬不知耻地对学生吹嘘说：上天把文化给了周文王和我，周文王死了以后，一切文化都在我这里，要是我死了，天下从此就不会有文化了。可是现在，上天并不是要消灭文化，而是把保存和宣传文化的权利交给了我，你匡人能把我怎么样呢？这里不仅充分暴露孔老二顽固维护奴隶制的反动立场，也清楚地看出天命观为“克己复礼”反动路线制造根据的反动实质。

孔老二还进一步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这是说，奴隶主和奴隶所处的不同地位是“天命”安排的，是不可改变的。因而就必须“知天命”、“畏天命”。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等级要按照西周奴隶制的要求行事，这就是服从“天命”。对奴隶主来说，象孔老二那样顽固地维护奴隶制，拚命反对改革，就是“知天命”；对新兴地主阶级来说，不破坏周礼，不进行改革就是“畏天命”，而对广大奴隶来说，老老实实当牛作马，不起义，不造反，也就是“畏天命”。否则，奴隶主就要进行镇压，这也是遵照“天命”。奴隶主的意志就是天命；“克己复礼”复辟西周奴隶制就是“天命”，这就是“天命论”的反动实质。

在孔老二看来，既然人的贫富贵贱、生死祸福是天命注定，那么人的知识多少才能大小自然也是命里注定。奴隶主生下来就聪明，奴隶生下来就愚蠢，这些都是天老爷的安排，不得改变。在知识才能方面，孔老二又把入分成了几等，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